

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

汉译精品
思想人文

重申启蒙

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美]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 著 殷杲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Stephen Eric Bronner

汉译精品 · 思想人文

重申启蒙

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美]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 著 殷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 (美) 布隆纳著;
殷杲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5

(现代思想译丛)

ISBN 7-214-04381-5

I. 重... II. ①布... ②殷... III. 法兰克福学
派—哲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2018 号

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 by Stephen Eric Bronner

Copyright © 2004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6-150

书 名 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著 者 [美]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

译 者 殷 杲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960×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381-5/B·131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致 谢

在帮助我审读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人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在罗格斯(Rutgers)大学参加了一场关于本书内容的研讨会,他们的评论和洞见令我受益匪浅:他们是埃利克·波希米、萨布里娜·谢文斯基、布莱安·格拉夫、阿隆·切克、格奥夫·库兹、玛莉莲·拉法伊、玛尔戈·摩根和布莱安·斯提普曼。此外我还想对帮助我审稿的莱斯利·拜尔勒表示感谢。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迪莫克,我也一并表示谢意,感谢他的大力支持。

序 言

本书打算重提启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传统这个话题。当然,21 世纪与 18 世纪可谓有天壤之别;往昔与当今难以相提并论。为了应对新情况,启蒙运动对知识分子参与世事的提倡以及这场运动提出的抵制压迫性权力结构的伦理模式都亟须重新阐释。如今,严格的进步概念已被遗忘;再也没有哪个组织或者政党能够宣称自己代表人类的理想,知识分子们则每每将大学等同于世界。电视、电影中的形象取代书本上的文字左右着公众。自由主义政体往往为帝国主义野心和寄生精英们所污染。左派和右派都支持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新扩张、官僚国家的崛起、媒体的联合、盲目的消费主义、对环境的忽视以及文化相对论均破坏着启蒙运动提出的诸多理念:世界主义的宽容态度、经济公正、民主的责任以及“良好社会”的思想。

不过,固然信奉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再能够保证实现理性的允诺,但强调公民自由的自由主义法治、作为社会公正的代理人的干涉主义国家以及要求承认“他者”的世界主义运动都仍旧是改善个人的生活、帮助个人拓展其经历范畴(这些正是进步的基本意义所在)的前提条件,或者毋宁说是其必要条件。与以往相比,当今参与世事的形势似乎比较平庸;也许如此吧。但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仍旧不逊往昔。普遍利益一如既往地存在。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天参与世事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沉浸在过去那种一挥而就“改变世界”的浪漫理想中。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行动固然有过于戏剧性之嫌，但是他们从来不曾陷入“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的陷阱。若是把他们看成乌托邦分子或者集权主义者，这在哲学上是错误的，从历史而言则是荒谬的。事实上，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试图以求实际、讲原则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过，世事沧桑，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能够将启蒙运动的解放理想付诸实现的“代理人”了。“人性”、无产阶级或者一度被殖民的民族都早已不再能够代表黑格尔所谓的“世界精神”。“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亦不复存在。不过，这些变化似乎过于频繁地被用做消极行事的借口。其实现在批评性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社团范围比以往更加广阔，进步主义组织名目前所未有地繁多，这些组织对付着——而且每每是积极地对付着——从世界性饥饿、保护个人自由到维护动物权利等等重大问题。非要指定谁是促成变化的“代理人”或者给各种事业的重要性加以排序，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目的论已经过时，也不再有什么实现自由的历史担保。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要加入哪个政党、社会运动或者利益团体；而是在于参与政治现实的决心以及选择一种能够在各个组织之间建立团结的伦理姿态。而实事求是地说，就对付这些问题而言，启蒙运动的传承仍旧能够焕发光彩。

我们不当轻言已经出现了团结的大好形势：左翼仍旧为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识形态割据战所困扰。启蒙运动的政治价值观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们与干扰合作的狭隘的组织野心对抗，而且因为它们为进步主义的行动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和推论的定位。随着民权运动和穷人运动的四分五裂，这种定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新近流行起来的是后现代性的各种变体以及——也许正位于所有这些变体的根源的——马克斯·霍克海姆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引发的“新型”批评理论。为了跟上激进政党的衰亡以及将抵抗等同于主体性表达的做法，启蒙运动遭到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内在”批评。它的政治传承因此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启蒙哲学家对于社会和制度革新的关注，以及马克斯·韦伯所谓

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变化的进步主义代理人之间的“有择性亲近”，现在似乎已经不为人关注，这一点在新形势下显得尤为不幸：新出现的跨民族运动往往迷惑于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功能性跨国政治机制也仍旧遭受着缺乏忠诚之苦。新的联络技术正为政治抵抗提供新的组织手段，扩充着人类的经验范围，开放重新理解彼此悬殊的文化的道路。以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为表现的新团结形式已经对帝国主义战争、过时的文化规范和独裁主义政治发起挑战。实现国际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等等不曾真正实现的梦想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惟欠在意识形态上赞同支持着这些理想的各种观念的愿望。正因为这个缘故，启蒙运动在我们的时代再度展现出重要性。

博爱并非只存在于过去，相反，它仍旧在发展成形。保守主义也许早在 20 世纪最后 15 年时就开始稳步发展。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如此之多的当代“激进”思想的妥协和日益增长的悲观态度就是合理的。真正的进步主义变化已经出现：独裁者们纷纷倒台，更多的公民得到了权利；为经济公正而进行的战斗已经获胜；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已经遭到攻击；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已经出现了诗歌——出色的诗歌。要忽视这些胜利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轻易地宣布它们都被“吸收”了；我们也很容易推崇一种古老、疲惫的态度，所谓“文化悲观论”的新版本。犬儒主义总是非常容易抬头的。但其实真正的挑战在于认识到“体制”（它从来不曾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得到过“总体管理”）已经因为启蒙理念所激发的社会行动而有所改善。

封闭的社会已经变得较为开放，并且——尽管有领域的、宗教的、剥削的和独裁主义的反对力量的重重阻挠——它仍旧有着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然而，想在哲学观点（它们令信仰者迷失在黑格尔所谓的所有牛群均呈黑色的黑夜里）的帮助下做出加入斗争的决定，这将以以往更为困难。我们有必要通过审视实际运动中表现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以对传统做出区分，而不是通过求助于形而上学来做到这一点。在这里，再次地，启蒙运动的激进民主和平等主义观念屡屡遭到背叛。

不过,这种说法说明的是它们中的确有一些东西不应遭到背叛。要想清楚认识启蒙运动中那些遭到背弃的允诺,我们就应当严肃地领略它的自由和进步的普遍观点,而不是站在“否定辩证法”、共产主义信仰、“实用主义”或者伦理相对论的立场上理解它。

有一点需要确定:普遍主义在类似“大英帝国太阳永不落”的西方帝国主义宣传和概念中也宛然可见。然而在现实中,这类普遍主义根本就不是普遍主义的:它缺乏互惠性、公开的对话以及保护个人免遭独裁权力伤害的意图:这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与它的模仿者有所区别的地方,它赋予启蒙主义一种自我批评的素质,使它得以抵制欧洲中心论以及关于“文明的冲突”的风行一时的信念。我们必须申明:它与被误导的宽容态度不是一回事。拒绝为“西方”批评提供娱乐的借口可以很容易被用来帮助压制性的非西方传统免遭批评,尽管哪怕非西方的精英也可以是独裁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从来就不欲仅仅因为传统存在而为之正名。它最出色的代表们倡导宽容,反对偏见;倡导革新,反对陈腐;认为少数派的权利高于多数派的热情,个人的道德自治高于宗教权威关于上帝启示的主张。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在于它对于特权和偏见的普遍攻击。出于其反思性和批评性特点,它最鲜明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束缚独裁力量、扩大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个人经验的可能性的主张。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榜样供当代知识分子奋力追赶,也展示了一种与压迫性的制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作斗争的样板。如果把他们的政治理论视为官僚的因循守旧思想或者集权主义的源泉,那真是大错特错。他们极力坚持政治行动可能——不一定是必然地,仅仅是可能——造成社会变化,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统治精英,而且也是为了反对那些会抵制这些行动和变化的人。他们预见到,一旦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贫贱的、被排斥的人的利益将遭到历史性的威胁。他们觉察出这将使个人被转变为一种用于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使他们显得无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成本”。

与这种境况作斗争,是启蒙运动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目标。这两者都激励着进步主义的集体行动,并且出于充分的理由,它们现在仍旧在激励这些行动。这两者的交叉点已经成为所有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智识起点。从世界主义出发,将自身认同于被束缚和被剥削者,正是这一立场的必要内涵。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传承所在。然而,为了充分利用它,我们必须强调,令人满意而有益的政治阐释高于时髦的伪政治哲学思潮的深奥、形而上学的奇想。如果说哲学果真是诺瓦利斯(Novalis)所谓的“先验的无家可归感”的一种表达(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也许现在我们应该令哲学面对政治了;时辰已到,浪子回头。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 (Stephen Eric Bronner) 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特聘教授、比较文学和德语研究专业研究生导师。著有《想象可能：保守时代的激进政治》(*Imaging the Possible: Radical Politics for Conservative Times*)、《行动中的理念》(*Ideas in Action*)、《批评理论及其理论家》(*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Theorists*)、《无拘束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Unbound*)等；编有《逻各斯：现代社会和文化杂志》(*Logos: A Journal of Modern Society and Culture*)等。

目 录

致 谢.....	1
序 言.....	1
第一章 阐释启蒙运动：形而上学、批评和政治	1
第二章 赞美进步	18
第三章 发明自由主义	44
第四章 巨大的分歧：启蒙、反启蒙和公共领域	65
第五章 取消犹太人隔离区——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	87
第六章 虚假的辩证：从启蒙到集权主义	102
第七章 经历现实：文化工业、主体性和身份	124
第八章 通往自由之路：权利、互惠和普遍主义敏感性	143
第九章 重续传承：团结、自然和种族	162

第一章 阐释启蒙运动：形而上学、批评和政治

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配合着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知识界也做出了相关反应；在这些反应中，启蒙运动的传承已经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争议的领域。人权经常被用来作为独裁权力的意识形态借口；西方国家的安全成为限制个人自由的理由；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们大张旗鼓地呼吁捍卫西方“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中最优秀的一些——政治自由主义、社会平等和世界主义——均扎根于启蒙运动，而且保留了激进特征。然而，不止是右翼在歪曲它们，这些价值观也遭到了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的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半心半意的自由派，还有推崇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作为结果，知识界和政治都迷失了方向。长期以来导致反动运动的种种思想——将经验置于理性之上、民族或种族身份置于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之上、社团置于个人之上、传统置于革新之上、神话置于科学之上——已经进入了美国左翼的思维。其信徒们因此对于自身应当契合的传统和他们的政治目的越来越懵懂不清。在智识方面，左翼丧失了一致性，这折射出其政治目的感的丧失。想要重建一种富于目的感的政治，我们就必须在新的条件下，调整对启蒙运动的认识。

充满嘲讽意味的是，保守派反而显得比较有见地。过去，他们哀叹

启蒙运动的“虚无主义”^{〔1〕}；它对社团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特权和传统权威的强烈攻击。保守派以及那些更偏右的人均不断驳斥启蒙运动对个人主义、异见、世俗主义、革新以及批评性反思的强调。正是这一点使他们与左派大相径庭。不过，现在许多重要的保守派人士在斥责西方的激进革新者和东方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时，都强调起了“理性”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对这一术语的“文化”调整将启蒙运动的激进精神和批评风气削减得面目全非。^{〔2〕}毫不奇怪的是，保守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捍卫混杂着反启蒙和反现代的偏见。他们对于性执照、家庭观的衰亡、文化“虚无主义”和传统的丢失、对悬殊生活方式的宽容态度以及国家身份的模糊化等等都惊恐万状。他们的“西方”不是启蒙运动的“西方”。这些保守派最担忧的乃是即将到来的“西方的死亡”，事实上，这和他们的父辈对“理性时代”的到来和对于白种人和基督徒世界特权的消失感到的恐慌异曲同工。^{〔3〕}不过，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已经偏向于右翼；激进的时刻已然消失。它不再被认为是划分“左派”和“右派”的一道界线。如果说关于基本政治划分日益增强的含混性的说法有道理可言的话，那么这应该就是它的历史根源了。

启蒙运动出于对自治、宽容态度和理性的强调——这与它对既有传统、公众偏见和宗教迷信的攻击一样强烈——而被认为是一切进步主义政治的基础。不过，马克斯·霍克海姆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

〔1〕 参见 John Ralston, *Voltaire's Bastards: The Dictatorship of Reason in the W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Ali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2〕 请注意这本巨大的文集，它收集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从“政治学”到“哲学的性”等等包罗万象的话题，但是对启蒙运动的政治传承却丝毫不曾提及。Cf. *Enlightenment, Passion, Modernity: Historical Essays in European Thought and Culture*, Mark S. Micale 和 Robert Dietle 编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参见 Patrick J. Buchanan, *The Death of the West: How Dying Populations and Immigrant Invasion Imperil Our Countr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oms Dunne Books, 2002)。

辩证法》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概念。该书出版于1947年，它写作的期间，正是两次世界大战闻所未闻的杀戮发生、大众文化和官僚国家生成的阶段，也正是丹尼埃尔·罗塞特(Daniel Rousset)谓为“集中营的宇宙”的阶段。该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它可以说既非历史，也非人类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著作，而是这些学科的融会贯通，其结果是惊人的，彻底颠覆了原先的进步观念。根据两位作者的看法，启蒙运动的科学手段的原初目的，也许是为了通过攻击宗教教条而实现解放人类的理想。然而科学理性的力量到头来不仅仅瞄向神灵，而且还对准了一切形而上学思想——包括道德和自由。“知识”与“信息”剥离开，规范和事实被分隔；科学手段日益脱离了对人类解放的承诺，将自然改变为一种统治对象，而科学手段本身则沦为谁出价最高就为谁效命的娼妓。

“工具理性”和马克思所谓的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被认为是一回事。因此，对一切事情都可以进行成本和利润计算。甚至艺术和审美情趣也可以被冠以“文化工业”之名——其目的只是为了替产品寻找最廉价普通的标准，使利益最大化。因此，工具理性剥夺了启蒙哲学家们推崇的“自治的”个人抵御集权主义运动的操纵的手段和意志。启蒙运动现在有了又一种含义：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以对文明的人类学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从一开始就是进步的对立面。这本书的力量由此而来：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不仅仅对一些先前的历史时刻及时作出批评，而且也对人类的所有发展进行了评述。这使得人们可以不必像世俗资产阶级那样将启蒙与进步等同，而是——无意地——将之与野蛮、奥斯维辛和所谓的“总体管理的社会”等同起来。

这就是《启蒙辩证法》一书描绘的画面。不过，我们不应当忘记，它的两位作者从启蒙本身的立场出发，批判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尤其是被称为启蒙运动的那个历史时代：这本书的标题也由此而来。他们的杰作实际上是“为了准备好一种实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与盲目统治

的纠结之中解脱出来”〔1〕。事实上,后来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甚至考虑过撰写一部续集,题目就叫《拯救启蒙》(*Rettung der Aufklärung*)。〔2〕这一拯救宏愿从来不曾实现,人们经常琢磨其原因。我相信,这原因在于他们的观点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如果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统治理性(它由一种日益圆滑的官僚秩序相佐),那么有效的或具体的对立政治形式就再也没有可能出现了;霍克海姆因此最终提倡起一种类宗教的“对全然他者的渴望”,而阿多诺则对一种基于“否定辩证”的审美抵制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杰作在批评理论中引发了一场巨变,但是它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放弃了一切对社会运动和政治制度的系统关注。他们两个人都不曾真正地领略启蒙运动的民主传承,因此他们令批评不仅与它的哲学基础脱离,〔3〕而且也与它可能为之服务的一切实际利益拆分开。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从来不曾真正意识到,与系统构建者、思路狭窄的经验主义者或者狂热者不同,启蒙哲学家一贯强调“一种对世事的更强烈的兴趣,一种对人及其作品以及他的理性的更强大的信心,一种不断增长的好奇心、永不知足的思想日益强烈的骚动——这一切与其说形成了某种学说,毋宁说是形成了一种精神”〔4〕。正如孟德斯鸠提出承诺公正的是律法的精神而非任何法律制度一样,启蒙运动的精神也反映出这种承诺的激进品性以及一种对历史局限性的批评,这种局限

〔1〕 Ma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John Cumming 翻译(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2), xvi.

〔2〕 请注意 1946 年 10 月 3 日,在“Unserthema; die Rettung der Aufklärung”中的讨论,它出现于这本书的 1947 年版本之前不久。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20 Bde. hrsg.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d Norr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89)12:594.

〔3〕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Frederic Lawrence 翻译(Cambridge: MIT Press, 1987),116.

〔4〕 John C. Gagliardo, *Enlightened Despotism* (Wheeling,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1967), 20.

性是哪怕启蒙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也难以逃脱的。经验主义者也许会否认“时代精神”的存在。然而，历史时代的确会产生一种风尚，一种对现实的生存姿态，或者一种甚至可以称为“工程”的事物，它将分散的参与者纳入一个更广阔的智识趋向或者运动。^{〔1〕}

启蒙运动就表现出了这样一种风尚以及一种尊崇对现实的变革的独特姿态。不过，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领会当时对明晰文体、清晰表达以及修辞学者所谓的“朴素的言辞”的普遍推崇。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倒是相信，正是为了抵制文化工业的侵袭，才出现了他们那种极其晦涩，或者毋宁说是佶屈聱牙的写作风格（他们藉此风格颇出了一些名，或者毋宁说是恶名）。他们深奥的学术风格无法与那些在公众场合对基本原理展开辩论的知识分子们匹敌，后者引入了自由撰稿的做法，用讽刺和机智攻击浮夸和教条，力图向大量受过教育的读者传播思想：莱辛曾经语调激烈地论及此点，后来这成为一句名言：“怎么说就怎么写，如此才是好文章。”而在1766年4月给达兰贝尔的一封信中，伏尔泰提出“20开的长篇巨著永远不可能掀起革命：那些小而轻便、售价30个苏的书才真正危险。如果《福音书》要卖上1,200塞斯特斯^{〔2〕}一本，那么基督教也许就永用无确立之可能”^{〔3〕}。

要令启蒙适应于现代，就必须再度拾起大众语言。这并不意味着要支持反智主义。在极其专业化的领域中，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中展开的论争，显然是要求专业知识的，而坚持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抵达大众”则始终是个值得怀疑的策略。^{〔4〕} 用什么语言来进行讨论，这要由

〔1〕 Peter Gay, *The Party of Humanity: 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Norton, 1954), 112.

〔2〕 塞斯特斯，古罗马银币或铜币，等于四分之一第纳流斯——译注。

〔3〕 Peter Gay, *The Party of Humanity: 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Norton, 1954), 112.

〔4〕 Stephen Eric Bronner, “Critical Intellectual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magining the Possible: Radical Politics for Conservative 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73ff.

讨论的话题来决定,而如果更简单的语言无法说清楚问题,那自然要使用术语。可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却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担心被文化产业兼并,因此回避政治参与,并将自由转入鉴赏家那形而上学—审美的收藏中。他们越来越难以领略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脉搏以及它的倡导者们为了政治目的而展开清晰辩论的能力——富兰克林、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潘恩以及卢梭。^{〔1〕}因此,无论他们的“批评”事业是否与往昔的脉搏“辩证地”合拍,其设想都阻止了他们现在或者将来做出任何肯定的评论。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始终未能以他们拒绝的那种风格为自己的作品写出续篇,而《重申启蒙》正是充当这部续集的一个尝试。本书的章节大致与《启蒙辩证法》平行,鉴于它的跨学科特征,本书不以迎合任何专业领域的专家为目的。不过,与《启蒙辩证法》不同的是,本书并非一系列“碎片”的合集——这是《启蒙辩证法》一书在首译为英文时被删掉的副标题——而且本书试图对一种联系理论和实践的传统观加以“实证”的运用。^{〔2〕}本书不欲同情元理论面对历史冲突时的无能为力,对于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经典作品与受它启发而出现的后现代作品之间的悬殊(它的意图是为了从启蒙本身的立场批判启蒙运动,但其结果却偏离初衷)也并不关注。^{〔3〕}本书关注的是启蒙理念(以及它们的对立理

〔1〕 对启蒙哲学家而言,“他作为普遍社会以及他对思想事务的实践行动的代表的新自我形象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不能为任何学术协议所吸引,而是以能吸引最广泛的兴趣,与当前的话题最合适的文体写作,以对教会和国家的官方审查产生最富麻醉的效果的方式来行动。”Leonard Krieger, *Kings and Philosophers, 1689—1789* (New York: Norton, 1970), 155—56。

〔2〕 请注意 Stephen Eric Bronner 涉及面更为广阔的讨论,见 *Ideas in Action: Political Tradi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1ff。

〔3〕 Daniel Gordon, “On the Supposed Obsolescence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载于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New Perspecti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Intellectual History*, ed. Daniel Gor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06。